

天津“国际社会学研究方法研讨会”综述

国际社会学研究方法研讨会 1993 年 8 月 24—26 日在天津召开。这次会议是在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和支持下,由美国杜克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林南教授和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天津社会学学会理事长、天津社会科学院院长王辉教授共同发起和组织的。会上有 6 名国外专家学者和 12 名中国专家学者结合个人的研究项目和特长,就社会学方法问题做了大会发言,其他与会代表做了自由发言,其主要方面有:

一、理论与方法之间的关系

这次讨论会是讨论社会学方法,但与社会学理论有密切的关系,方法以理论为基础、为前提,方法的运用亦可延伸理论思考,发展理论研究。

一些研究婚姻家庭的代表结合 80 年代以来我国有关家庭研究的热点指出,方法的选择以理论为基础,方法的更新也是以理论为基础的。比如我国的许多学者曾就我国家庭模式的转换做过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之所以选择家庭模式作为家庭研究的突破点,就是基于下述理论认识:即社会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家庭的本质是家庭关系,研究家庭关系即可触及家庭变化的最本质的方面。另外我国 80 年代到 90 年代关于家庭模式的研究由表面到深入也是以理论为基础的。在 80 年代初、中期许多研究都已经证实大家庭正在分解,家庭模式正在核心化、小型化的事实与趋势。然而,这毕竟只是表面现象,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理论上说,我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和文化传统,世代同堂的理想,儿孙绕膝之乐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双向反馈模式的代际关系也不会瞬间解体;今天中国家庭关系变化的突出特点是现代与传统的融合。只有从现代与传统的结合点上才能更准确、更全面地把握现代家庭的变化和特点,因此,对方法的要求是由家庭小型化研究转入家庭生命周期和家庭网研究。关于家庭网的研究是家庭模式研究的横向扩展。家庭模式研究的纵向延伸与横向扩展是以现代与传统的冲突与融合理论为基础的。

方法的研究是以理论为基础的,方法的使用及所得结果也能发人思考,促进理论研究的发展。如我国

学者在使用统计方法研究家庭模式及其转换时发现了多数家庭在循环的初始和结尾部采取主干家庭模式,而中间阶段采用核心家庭模式,因此提出了家庭模式“U”型循环理论。另外关于家庭网的研究也是由方法的使用扩大了家庭模式研究的视野,由研究单个家庭的内部关系到研究多个家庭之间的关系,从而产生家庭网络理论。

二、社会学能否使用其他学科的概念、范畴

美国华盛顿大学雷伟立教授运用在江苏、四川的实地调查资料,分析了我国农村择偶的价值观念和婚姻流向,指出女性由贫困地区向相对富庶地区流动的事实和规律,提出了婚姻市场概念,进行了婚姻市场分析。

一些与会代表表示异意。有的人认为婚姻现象是复杂的,经济因素尽管起了重要作用,但还有爱情等其他因素起作用,特别是现代城市社会,爱情在婚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甚至起决定性作用,它是不能用经济因素来解释的。还有的人认为市场是经济学概念,用它来解释婚姻一类的社会现象是不科学的。婚姻择偶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非同于经济市场上的等价交换。婚姻中聘礼与嫁妆也与货币购物、以物易物不同。完全用经济规律与经济学概念解释是不确切的,不能自圆其说的。

另一些人则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解释全部社会现象和规律,能解释一部分就可以了,就能成立。尽管经济因素不是影响婚姻的唯一因素,但在现实生活中,其影响力常常很大,女性从贫穷地区向富庶地区流动的现象仍然很普遍,不仅国内如此,国际间也是如此。

至于经济学概念范畴能否运用到社会学中的问题,一些人认为不同学科之间概念的相互渗透和使用是个普遍的现象,经济学概念使用到社会学中是可以的,但可能有不同的解释,比如婚姻中的交换价值是普遍存在的,它不等同于经济学中的精确的等价交换,而是通过交换得到一种模糊的平衡,是不能精确

计算和测量的。这不等于说交换价值在婚姻行为中不存在、交换理论在社会研究中不能成立。美国社会学家温奇创造了婚姻交换理论,提出了婚姻交换中的12要素,经济要素只是其中之一,这种理论又分为同质交换和异质互补两种,成功地解释了择偶中的许多行为和心里,这是用交换理论研究婚姻的成功例子。

三、定量分析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应用

自我国社会学研究恢复以来,定量分析方法被应用得越来越多,计算机也使用得十分普遍。在讨论会上,与会代表一致对定量分析方法的使用和意义表示肯定。一些代表还就定量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的问题做了发言,指出只有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才能准确而深刻地说明社会现象的本质,并且阐述了把人类学深入细致的观察方法与社会学抽样调查统计方法相结合的必要性及紧迫性。

在谈到统计与定量分析时,一些代表提出要使统计方法进一步科学化、完善化与深化。80年代初期和中期我国许多社会学家还不能独立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常常要请专门从事统计和计算机工作的专家帮忙,现在许多人已能独立完成统计工作,并能娴熟地使用计算机,这是一大进步,它表明我国的社会学研究队伍逐步走向成熟。在统计方法的运用上也已由原来的单变量描述和汇总统计分析、简单双变量相关分析,发展到多变量、多元分析,回归方法、因素分析方法和结构方程方法开始得到使用,并显示了积极作用和效应。林南教授结合自己关于“中国城市的分层与流动——一个多元模式”的研究,介绍了多元分析中的因素分析方法和结构方程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够把现实变量转变为虚拟变量,把具体因素转化为抽象因素,并能探讨虚拟变量之间、抽象因素之间的联系,从统计上给以说明。

四、关于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方法

一些与会代表提出应总结和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方法,以适应研究中国社会,发展中国社会学的需要。一些代表列举了毛泽东及其同事早年对中国农村所做的典型调查,提出这种调查方法深入、细致,可解剖麻雀,特别有益于了解社会和社会现象的本质,比抽样调查、统计方法有其特殊的优越性。这种方法在今天不仅不应放弃,而且应该总结推广,发扬光大。

另一些人则认为,从80年代以来一些人强调创

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以后又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方法,这是不够科学的。科学无国界,社会学做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是跨国界的,有共同的理论、原则、概念和方法,而不可能因国而异,一国一样。所谓中国的社会学只是把社会学的理论方法运用于研究中国社会,尽管有些理论和结论是特殊的、有特色的,方法也会因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仅此而已。就好像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社会革命的具体实践那样,其实践是特殊的。但其社会主义理论原则却是世界共同的,是根本的。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以及根据这种特殊性去建设社会主义所采取的特殊方法,并不等于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原则也是与众不同的。今天我们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是要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特别是社会学研究不要只是从理论到理论,而要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其结论是带有中国特色的,但其理论方法与其它国家的社会学没有根本的区别,而且在主要方面是一致的。只是从这点上去理解,才能准确地把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的涵义,以及社会学本土化的方向。如果不是这样理解,那就会出现美国社会学、日本社会学、英国社会学、法国社会学、德国社会学等都不一样,有多少个国家就有多少个不同的社会学的谬误。就会出现热衷于独创体系,盲目追求特殊性的错误。一些与会者认为在强调社会学本土化的同时,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应注重社会学共同理论、原则与方法的创造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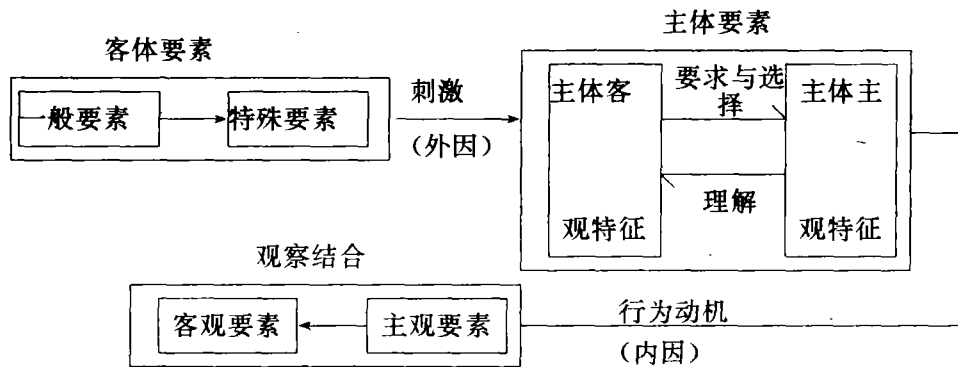
另一些与会代表则坚持认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的提法是正确的、必要的,他们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角度阐述了否认矛盾的普遍性是错误,即否认社会学有共同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是错误的,同样否认矛盾的特殊性也是错误的,即应该建立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而不应否认其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五、社会学研究社会问题的着眼点问题

从事一项社会问题研究应该如何入手,是出席这次国际社会学研究方法研讨会的中外学者们普遍关注的又一个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社会学的综合性特征决定了社会学研究方法应该注重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结合。但是,一部分学者更加强调从微观出发揭示社会现象。有的学者在发言中提到,十几年来,中国大陆的某些社会学研究存在大而空的问题,其原因之一是忽视了从微观角度着眼来研究社会现象的。但是,也有的学者认为,社会研究

的原则之一是全面反映社会现象的特征,也就是说,社会研究者应当从社会现象的各个方面,从它与其他现象的各种联系和中介去观察、规定某一现象的社会特征及其属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应从宏观出发研究

某一社会现象,把影响这一现象的所有要素和条件尽可能地抽取出来进行分析和考察,由此形成了如下综合分析模型:



在这个综合分析模型里,客体要素是研究对象的外部环境,主体要素是指研究对象中的行为主体(个体或群体),观察结果则是指被观察和记录的各种结果。对于这种研究思路有的学者认为属于社会学的方法论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属于认识论问题,也有的学者认为难以操作。

六、社会学调查的具体方法问题

关于社会学调查的具体方法,是与会代表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 关于问卷调查。与会的学者们认为,近年来,问卷调查在中国大陆有了广泛的应用,它对于大范围内收集资料和快速处理调查数据发挥了积极作用,是社会学调查收集资料的主要方法之一。但同时也必须明确,问卷调查只是诸多调查研究手段中的一种,不能代替其他研究方法。特别是在对调查对象和研究的问题没有足够了解的情况下设计问卷和用来收集资料,很容易带有主观性和片面性。并且,问卷调查有其适用范围和若干限制条件,尤其在中国大陆农村,文盲、半文盲占相当比例,利用问卷收集资料存在着一定困难。另外,学者们还就问卷设计的科学性、填写问卷的真实性、对问卷中的问题理解的差异和表达的准确性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2. 对关于调查点的选择问题。与会代表们认为,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择调查点和调查对象,可以避免主观随意性。但是,一些中方学者强调,在对所调查的问题和调查地区比较了解的基础上,运用典型调查方法确定调查点也是一种可行的途径。另外,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宋林飞教授、中央民族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

贾春增教授等人主张,如果从事深入细致的农村社会研究,最好选择研究者本人熟悉的地方(例如自己的家乡)做调查点,这样,一是可以便于获得深入、细致的调查资料,二是可以依据自身的生活经验判断资料的真实性,便于获得可靠的资料,从而可以取得较好的调查结果。但是,也有的学者认为,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做社会学调查,存在着不易发现新问题的缺陷。

3. 关于观察法、访谈法。与会代表们认为,在当今社会学研究中,观察法、访谈法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次与会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教授沙真理、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戴慧思等人就是主要运用观察法、访谈法来研究中国城乡社会生活的。学者们认为,从事中国农村调查,运用观察法、访谈法有助于加深对调查对象的了解。但同时也应注意这两种方法的局限性。

另外,有的学者认为,在家庭研究方面,除利用抽样问卷调查、访谈法、观察法、文献法等来收集资料以外,还应进一步使用家族口述史、对家庭周期的研究、国家间的比较、历史的比较方法等。

4. 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过去中国学者往往擅长于运用定性分析方法分析社会现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学者迅速地引进西方学者注重从事发展过程中的数量变化来考察事物的定量分析方法。但近些年来,又出现了忽视定性分析的倾向。与会学者们认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是人们认识社会现象的两大主渠道,二者是辩证统一的。研究者的结论要符合客观实际,就必须把两种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如何把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定性分

析的准确度更高? 中外学者联系自己的研究实践, 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来自四川社会科学院的刘成根教授提出了所谓“四一”模式, 就是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认识一个对象(微观对象或宏观对象)、一个过程(短期过程、中期过程或长期过程)、一个作用(直接作用、间接作用、显性作用或隐性作用)、

一个趋向(近期趋向或远期趋向)。这种“四一”模式使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合二为一, 把对事物的静态观察和动态观察融为一体。这就使研究者从社会现象的本质属性和数量特征上掌握了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

(潘允康 唐忠新 郝麦收)

中国农民生活程度之研究

本文载《社会学刊》第1卷第3期(1930年), 作者乔启明。该文用金陵大学农林科农业经济乡村社会学以“标本调查”方法在中国南北各省选择的十几个模范的地区所获资料来分析中国农民的生活程度。这一调查在1922—1925年。调查范围有安徽怀远、宿、来安, 河北平乡、盐山, 河南新郑、开封, 山西武乡, 福建连江, 江苏江宁、武进, 共计6省11县。其中临山和江宁各有两个调查点。共计调查地点13处, 调查农家共2370家, 平均每个家庭人口5.94人(家庭指包括与家长常年同居共食的家属及雇工)。生活程度的调查内容是食物、衣服、房屋、器具设备、燃料、医药、生活改进费、个人嗜好、保险与储蓄、杂类(如婚丧诉讼等不列入以上项目者)。调查结果每一农家的全年生活用品价值为228.32元(当时的货币)。从调查可知中国北部农民的生活程度不若中东部。因中东部农民用于食物的费用较少而用于衣服与其他方面的比北方农民多。与美国2886户农家的调查比较, 则每家全年用费之比是1:16.6, 可见中国农民生活程度之低下。据这一调查, 佃农的生活程度比自耕农与半自耕农为低, 而自耕农与半自耕农相差较微。

作者认为农民生活已低到极限, 其原因是: 农村人口过多, 农场面积过狭, 生产效力过低, 交通不便。针对以上问题作者主张: 实行移民殖边, 提倡实业及节制生育; 这样农场面积可增大; 农场可使用机器提高生产效力, 减低生产费用; 国家发展交通。